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斯特桥市长 / (英) 哈代 (Hardy, T.) 著 ; 曾胡译.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2002. 10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ISBN 7-80657-436-0

I. 卡... II. ①哈... ②曾...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8270 号

书 名 卡斯特桥市长
作 者 [英国] 托马斯·哈代
译 者 曾 胡
责任编辑 赵 薇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常熟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4
字 数 273 千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436-0 / I·340
定 价 (精装本)17.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导 言

《卡斯特桥市长》写于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五年,是哈代创作生涯中最初四部作品中的第一部,另外三部是《林地居民》(*The Woodlanders*)、《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和《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一八五五年四月十七日,他写道:“《卡斯特桥市长》最后一页写毕。此书的创作至少是一年前开始的,其间每一章的写作均频频被打断。”^①被打断的原因,除了到伦敦的旅行和休假外,便是兴建他永久的家“迈克斯门”了。在婚后的十多年里,哈代总是从一个租来的寓所,搬到另一个租来的寓所。他终于出于“气候原因”而决定不住在伦敦,离他的出生地上博克汉普顿不远的乡村小镇多尔切斯特,是他想卜居的地方。他没有选择一个文化或人口的中心城市,没有选择像温彻斯特那样具有历史传统的地方,也没有选择他妻子艾玛喜欢的城市德文。哈代曾说过,他愿意住在他笔下所写的场景里。他在写作本书的同时,“迈克斯门”也在规划和建造中。它不仅是为了纪念哈代的青年时代(罗伯特·基廷斯说,本书开头的那几章,写的就是他母亲年轻时的凄惨生活,她对他讲的故事构成了这些章节的基础^②),而且也是这个地方与哈代个人之间的独特的结合点。在创作这部

① 见哈代的自述《生活与工作》(*Life and Work*),第一七七页。——原注

② 见罗伯特·基廷斯(Robert Gittings)的《老年哈代》(*The Older Hardy*),第四十一页;又见《青年托马斯·哈代》(*Young Thomas Hardy*),第八—九页,第十四—十七页)。——原注

小说之前和期间,将“威塞克斯”(Wessex)作为他小说总体环境的想法就已固定下来了,他暮年时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是以西英格兰的场景和生活为基础的。

多塞特人雅好文学,哈代也是个爱舞文弄墨的人。他以《卡斯特桥市长》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这不仅反映了他对郡县文化主题的本能的回归,或对充满激情的童年世界的本能回归,也反映了他对文学的批判。哈代对别人如何评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很敏感。一八八三年四月出版的《西敏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上发表了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的一篇回顾文章,第一次对他的已经得到承认的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评论。这篇评论也许是由刚刚出版的《塔楼上的两个人》(*Two on a Tower*)引起的。艾利斯对《塔楼上的两个人》和对上述那些小说的评说,也许促使哈代后来将精力集中在了他所了解的事情上,运用了他所熟悉的场景:

哈代先生在每一部近期的小说中,都设定了一种明确的、占主导地位的背景。在《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里,他以一种随处可见的老派的方式,描写了构成多塞特郡风光的、开满石楠花的荒野。他在《喇叭少校》(*The Trumpet Major*)中描写的热闹非凡的军事调动,技巧相当圆熟,令人无话可说。《冷漠的人》(*A Laodicean*)是一部具有建筑学风格的小说,而《塔楼上的两个人》则有天文学的风格。这种方法为小说增添了鲜活而多变的魅力,从而使哈代先生的作品不会混同于别人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却愈来愈不能令人满意了。对天文学风格的沉迷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宁愿选择

普洛特先生(Mr. Proctor^①)的那种大众化的天文学风格。

艾利斯对哈代的作品既大加揄扬,又略有微词,这就使哈代比较容易地接受这种看法。哈代为此给艾利斯写的感谢信很含糊,这说明他对自己的作品在别人的眼中具有怎样一个“外观”,是很敏感的^②。当然,他没有宣布自己未来作品的计划。很显然,在这篇评论之后出版的那四部伟大的小说中,对其中的主角和职业的描述,需要大量的知识,而他本人从第一个职业——建筑业——中积累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也许在艾利斯的评论中还可以找到确定《卡斯特桥市长》一书特质的线索。哈代除了对公众意见的敏感,以及渴望找到能让他感到满意的主题外,他也强烈反对别人的“照样模仿”。在《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取得成功后的前十年里,由于主题的缘故,他将后来成为《林地居民》的故事放在了一边,没有写小说,而是写了一部人情喜剧《埃瑟尔贝拉之手》(*The Hand of Ethelberta*)。这部作品是他数次失败的试验中的第一次。事情未始不是这样的:艾利斯强调他描写女人的技巧,这使他很恼火(尽管在他的信里并没有流露出这一点)。在哈代的朋友中,只有约翰·拉夫迪(John Loveday)得到了艾利斯明确的赞扬,被称为是“高贵的”。在《卡斯特桥市长》中,也许哈代企图向艾利斯这样的人展示两点:其一,他是如何写男主角的;其二,他可以写一个不以爱情为情节动力的故事。

当然,哈代坚决转向以农村和凄惨的社会环境为内容的悲剧性主题,并非仅仅是由于艾利斯评论的压力。他已经为自己作品

① 《天文学诗篇》(*Poetry of Astronomy*)的作者,该诗出版于一八八一年。——原注

② 见哈代的《书信集》(*Collected Letters*),第一一七——一八页。——原注

的发展做好了准备。由于哈代开始了与“多塞特郡劳动者”的接触,迈克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将创作《塔楼上的两个人》(一八八二年)和《卡斯特桥市长》之间的阶段,视为哈代的汲取原料期。移居“迈克斯门”表明了哈代对前述小说环境的实验和居无定所的生活的不满。然而,正当哈代进行自我评价的关键当口,艾利斯的评论发表了。他预言,哈代在未来更可能写出的,是《塔楼上的两个人》那样的劣等作品,而不是《远离尘嚣》那样的作品(在他的评论发表时,他认为该书是哈代最成功的作品)。这个预言至少是促使哈代进行“深思熟虑的尝试”的又一原因。用米尔盖特的话说,是“拾起了久已湮灭的威塞克斯的线头”^①,并“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自己小说家的地位。”^②

在这次重塑自我的创新中,哈代笔下的亨查德是众多人物中最突出、最夺目的主角。围绕着他而创作的那些人物和他相比,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却是他周围的一群引人入胜的角色,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与社会的场景。卡斯特桥市长是迈克尔·亨查德,而迈克尔·亨查德就是卡斯特桥市长。采用形式上的重复,正是这部小说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之道理所在。亨查德是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自私的人,不能切实地表现自己的爱,然而他却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深度。一方面,尽管他常常缺乏远见,具有侵略性,没有持久的激情,但他对惩罚的耐受力却毫无疑问地可以贴上“悲剧”的标签。亨查德完全可以说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小说中最具有希腊特色的主角,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一类

^① 见迈克尔·米尔盖特的《小说家的生涯》(*Career as a Novelist*),第二〇四页。——原注

^② 同上,第二二二页。——原注

人物：俄狄浦斯^①、克瑞翁^②、阿伽门农^③，以及埃斯库罗斯^④笔下的普罗米修斯^⑤（暂且不提另一类圣经和伊丽莎白王朝时期的受难者——该隐^⑥和李尔王^⑦）。他就是自然力的体现。他的品质是无法条分缕析和“理解”的，无法和他的行为相剥离。同样，若将亨查德变成一个抽象的人物，就会将他的力量抹杀。也许可以不恰当地说，他就是简单地生存着——他身上的一切品质，决定了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另一方面，亨查德身上的所有矛盾和不可知的东西，都是以人性的原动力为基础的。本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爱情的态度。他“天生”厌恶女人，这决定了他对爱情的态度是冷淡的。然而，与此同时，“家庭生活的孤独”使他像约伯^⑧那样诅咒自己的日常生活：他抱怨自己阵发性的忧郁。作者很快就表明，他需要找个人来“倾泻自己的热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亨查德的需要不包括性爱或罗曼蒂克的爱情。卖掉苏珊使他感到羞愧难当，但妻子（或女儿）的死却不会给他带来丧亲之痛。他重新娶苏珊，并不是为了他们爱情的新生，而是因为他感到有一种对“权利”的始终

① Oedipus，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子，曾误杀其父而娶其母，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死。——原注

② Creon，希腊神话中的科任托斯王。——原注

③ 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王，曾发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是希腊军队的主帅。——原注

④ Aeschylus（约公元前五二五年—公元前四五六年），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他最负盛名的悲剧。——原注

⑤ Prometheus，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祇，因将天火偷到人间，触怒了主神宙斯，遂被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遭受神鹰啄食的折磨。——原注

⑥ Cain，圣经传说中的人物，因为杀害了他的弟弟而遭流放，四处流浪。——原注

⑦ King Lear，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的主角，因遭女儿虐待而流浪荒野。——原注

⑧ Job，圣经传说中的人物，曾是百万富翁，后破产，一贫如洗。——原注

不渝的义务和责任。他愿意娶露茜塔(在苏珊回来之前),是因为这样做似乎是正确的。当事情很清楚,他又得向露茜塔求爱并娶她时,不管是出于爱还是出于义务,他对结婚的主意又变得怠慢起来了。在他知道伊丽莎白—珍妮不是他的女儿后,他是能够毫不涉及性的感情与她比邻而居的。他感受到的最强烈的爱,是长兄式的(伐弗雷像他早年过世的兄弟),是父亲式的(“最温柔的人性纽带”激发了对“找个人来倾泻自己的热情”的需要)。尽管对亨查德其人和他的感情存在许多看法,但并没有一个定论。

“他是这样一种人:无论是一腔柔情,还是一团怒火,他必须找个人来倾泻自己的热情,这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需要”。从这段描述中透露出了他在感情方面的一条清晰可辨的、然而却是很重要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它使人想到,这“热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在卡斯特桥的十八年里,他没有爱慕人的感情(在泽西岛与露茜塔的那段感情交往,显然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热情”都倾注在了生意上。埃伦·肖沃尔特称之为“将性爱升华为商业的活力”。^①当然,亨查德个性中的某种潜在的感情需要得到了升华。当亨查德发现伊丽莎白—珍妮不是他的女儿后,他是想娶露茜塔(在苏珊死后)来填补他的“感情空间”呢,还是想得到那份额外的财产?人们在想到这个问题时,就会再次注意这一思想脉络。人们注意到,在亨查德的身上有首鼠两端和难以抑制冲动的迹象。但更多的迹象表明,这部小说中写到的惟一的爱情,亦即亨查德显然痛悔失去的那段爱情,是与性无关的。它是发乎于他的自身。同样,金钱不能使爱复生。亨查德在感情方面的思想脉络表明,尤其在涉及到女人的时候,由于他的自我藐视,也许他并不希望被别人所爱。亨查德对爱的典型态度是:拒绝、冷漠和抛弃。要培育出完满的关系

^① 见埃伦·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批评的方法》(*Critical Approaches*),第一〇六页。——原注

或交流之类的东西,在他似乎是做不到的,他也培育不出互惠的责任感。

从亨查德的整个行为来看,这种对互惠性的摆脱对他的尊严和孤独是有益的,且不说它的象征性的价值。强调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除了性以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即使在个人对个人的关系中,亦复如是。他对生活不满,他富于侵略性,争强好胜,有征服欲。但最后,当外在的成功的花服以及后来内在的补过的企图统统被剥夺后,便剩下了赤裸裸的他,于是,他对生活的不满,构成了这部小说精彩的篇什。与李尔王的相似性,既非偶然,也非机械性照搬。类似的遭遇丰富了读者对亨查德的理解。也像李尔王那样,拒绝对自己动机的诘问或这种诘问以失败而告终,造成了自我孤立的结局,造就了一种崇高。这不禁使人想到,亨查德的生活强烈地吸引了读者,以致他们不再注意露茜塔和伐弗雷的不值一提的追情逐爱。

亨查德的表现与书中其他人物及这部小说的情境的反差牢牢地吸引并保持了读者对他的注意力。在这部小说中,他的生活是凄惨的,但他又的确很专横,使得人们尽量避免对他下精确的定义。相比之下,本书中其他角色的面目就清晰得多了,尽管这幅生存意义的图案显得错综复杂。也许人们难以把握作者的描写和其他人物的动机,但我们却可以直截了当地看清这些人物的生存意义,即使看得不准,亦不会失之过远。然而,亨查德的行为方式,却使他潜在的天性如在五里雾中。

尽管对亨查德也许得来一次临床检查(尽管我并不想指出他是个神秘的、“古怪”的人),但他和其他的人格格不入,却是显而易见的:他强烈的性欲望、家庭对他的束缚、他那兄弟般的回忆、他作为父亲及后父的感情——在小说中其他的人看来,全都是中规中矩或不中规中矩的。因此,他被抛在了一边,显得那样另类,那样凄惨。这恰恰是因为他是个很例外、很独特的人,他无法在这样一

个社会上生存。每个层面的人(就连新来乍到的伐弗雷也不例外) ,都得承认这个社会的一致性 ,尤其要和久远的传统保持一致。因此 ,虽然伐弗雷和亨查德一样 ,是个外来者 ,也是个财富之车的有潜力的驭手 ,但他却没有遭受到亨查德那样奇特的败落 ,因为他能“适应”环境。他爱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 ,可是 ,一旦这些魅力暴露出是危险、俗丽的(按照他传统的标准) ,他便心安理得地和另一个更明智的女人谈情说爱了。亨查德的独特性以及他对常理的排斥所带来的精神状态 ,读者们在伐弗雷那里找不到。在亨查德的特殊性中 ,哪些是有感染力的呢?我要说——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也会这样说——那就是他为了一个自己并不理解的目标而进行的毫无指望 ,但却坚定无畏的努力 ,那就是承受因自己率性而为而带来的后果的折磨。这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意志力——诚如他所说的 ,这是自我的满足 ,在他已经做过的事和正在做的事中 ,这种自我满足肯定是他行为的核心。他宁愿麻木地逆来顺受 ,也不愿规避、辩解 ,因此他是正直的。像俄狄浦斯和李尔王那样 ,亨查德宁愿抱怨使他遭此厄运的灾难。

这本小说是对孤独的经典研究 ,因为它不是分析性的 ,不是知识分子气的 ,因而极具权威性。哈代写了一个人的孤独 ,这个人需要和其他人接触 ,可一旦这种接触成为可能时 ,他却又无法忍受其令人窒息的冲击。不可避免的是 ,其他人在意识到自己遭到侵害时 ,原本属于人性基本素质的自我认识的能力就受到了妨碍。

亨查德的行为是“孤立”的 ,他总是不断地调整自己对一些人的感情 ,而那些东西从内心里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他准确地称自己是该隐——他从经验中得知 ,哪些是社会所承认的 ,哪些是神圣的法律所容忍的。他是个似有家而实无家的人 ,他永远不能设法 ,也不能和其他人保持正常的关系。就此而言 ,他也算是个该隐。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生在哪里 ,长在何方 ,他的基本性格是在英格兰的哪个地方获得的。我们对亨查德背景的

塑造力的了解，远不如对这出戏剧中其他主要角色的了解，尽管他们和他一样，没有一个是这座小说中的城镇的土著。“卡斯特桥市长”几乎完全是一个政治身份，它没有和这个社区建立社会的或心理的血缘联系——虽然亨查德对这个社区的偏见和迷信比伐弗雷要来得重。

亨查德非同一般的坚忍和力量非但没用来造就他稳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他在做生意或纯粹的谋生时获得的——反倒加重了他的孤独。他可以完全靠自己的意志力将戒酒的誓言保持了二十一年，依靠“精力充沛”在粮食买卖上获得成功；但是，他对伐弗雷和伊丽莎白—珍妮却不能保持基本的关注或钟爱，如同对年轻的苏珊那样。嫉妒和猜疑所导致的猛烈爆发，使伐弗雷失去了耐心。嗣后，在种子店的问题上，接连产生了怨恨和暴力。他对露茜塔的感情是渐变的，由激情到怜悯，到落寞，到贪婪，到嫉妒。他和她之间似乎完全不是一种简单的发展关系，而是一系列各类关系的组合。他对伊丽莎白—珍妮，则有着更为多样的感情历程：从她和苏珊到卡斯特桥后的接纳，到发现她真实的身后的深恶痛绝，到他在病中时心甘情愿地让她服侍，到他真心实意地愿意和她住在一起，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爱倾注在她的身上。（除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任凭最后的这种钟爱控制了自己，戕害了自己，但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她的最后的爱会持之以恒。）几年后，哈代对亨查德的评论也许可以说明他对个性的部分看法：“我比以往更坚信，人有千态百面，随着环境的不同，就会浮现出相应的一面。”^①但亨查德却让人类的这一特性失去了控制。

不过，这部小说不是完全在写亨查德，也不仅仅是亨查德在若干关系间穿梭。倘若说，在亨查德的挣扎与受难的极处是孑然一身的话，那么，其他角色也并不是单薄的衬托。伐弗雷的身上就有

① 见哈代的《生活与工作》，第二四一页。——原注

许多可探讨的东西。在欢宴时那富于感染力的苏格兰民歌,定工钱时的锱铢必较,在他和伊丽莎白—珍妮寻找亨查德的过程中说“又得花费一个金镑”时的勉强,都表现出了他的冷漠和近乎伪善(至少也是浅薄)的个性。但他对露茜塔和伊丽莎白—珍妮两人的感情还是忠实的、坦荡的(尽管他在这两个女人之间进行选择时不免有机会主义之嫌,有着一种潜在的不稳定性)。在亨查德家道中落之前和之后,他与之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乎情理的。从许多细节来看,伐弗雷和亨查德对卡斯特桥这一方土地产生了同样强大的影响。倘若说,在这部小说中,亨查德的缺点使他出于怨恨而令人扼腕地在生意场中与伐弗雷玩花样,从而导致了他的败落,那么,伐弗雷身上的缺点显然也会使他遭此下场的。(当然,问题是伐弗雷败落的悲剧性还是差可承受的。毫无疑问,人们可以从容地对伐弗雷的缺点和美德进行推断和权衡,这种从容恰好说明他缺少复杂性和难以名状的内心张力,而这些却使亨查德的苦难如此令人动情。)

伊丽莎白—珍妮多少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尽管她的第一次露面是令人起敬的,然而,当她听说露茜塔是新发乍富时,她还是感到心烦意乱(比听说某人很有教养时,要心烦意乱得多)。但是,她也得到了作者的偏爱。例如,第九章一开篇,就写了伊丽莎白—珍妮对卡斯特桥环境的感受,详细地描述了卡斯特桥城乡的方位,而她在当时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她,说了不少至理名言。她那平和的意识和对事物价值的洞察力,也许是有吸引力的,是值得赞扬的,以致她的看法成了道德的试金石。但是,她结婚那天拒绝亨查德的那股劲头——也包括亨查德的谎言导致了纽森的痛苦的那番不实的言论——说明了,她在小说结尾时表达的那番自我保护性的激情,以及她以前毫不怀疑的那些主张,与她的那种焦躁无礼比较,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伊丽莎白—珍妮的行为碰巧又是内心的不平衡造成的,这会使一部小说具有全然不

同的观念,也许正是这一点鼓励哈代写了下去。正如哈代说的,她的母亲对她有支配性的影响,所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她更像是迈克尔·亨查德的女儿,而不是那温和而又浅薄的纽森的女儿。

对伊丽莎白—珍妮的母亲苏珊的描写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亨查德对她很藐视,从作者那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亨查德误解了她的智力。然而,她在这部小说中的历程却表明,她能够不断地战胜环境:她在一瞥之下就看透了纽森的秉性,将一个吹毛求疵、牢骚满腹的丈夫,换成了一个尊重她个人想法的丈夫;当她意识到自己与纽森的法律地位有问题时,她设法摆脱了他;在自己与亨查德相认之前,她对他进行了估价,从而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地位;最令人惊讶的是,为了能让她幸存的女儿在她死前过上好日子,她掩盖了女儿真实的年龄和身份。在其他人的勃勃精力目前,她似乎显得苍白麻木,但她的目的却全都达到了。是她天生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呢,还是作者仅仅把她当作了其他人的方程式里的一个整数?

小说描写中的这种自我修饰,对理解亨查德极有意义。哈代是将亨查德作为悲剧人物构思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部小说中,还没有一个男女角色如此彻底地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在变幻莫测的文章中,没有一个男女角色的地位,像亨查德那样遭到作者如此讽刺性的质问。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亨查德说他的话就是合同,但在他没见到乔普之前,为了雇用伐弗雷,便立刻撕毁了他和乔普的合同。他对天气预言家的拜访,使人想到他祈求宇宙之力的深深的本能意识,以及满脑子的迷信意识和民间传说。但是,作者的描述表明,令人瞠目的预言并不比加布里埃尔·奥克^①的预报更神秘。这种双料的预见功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标准,就是悲剧

^① Gabriel Oak 哈代的另一部小说《远离尘嚣》中的羊倌,善于观察和预报天气。——译注

性的或装神弄鬼的方法。

当然，本书一反传统的悲剧写作手法，采用了反讽的方式。亨查德在“三水手旅店”强迫唱诗班唱《圣歌》来诅咒伐弗雷，实际上，诅咒的力量却应验在了亨查德自己的身上。这诅咒隐约地、但却明白无误地反映在了他的临终遗嘱中。愿望的简单倒置和恶兆的力量是紧密相连的，这力量比亨查德要大。亨查德翻看着教堂乐手的圣诗集，利用唱诗班唱圣歌的机会警告对手，从而使自己的感情表面化了，但当他蛮横地对待“三水手旅店”里的那些人时，也许马上就缓解了他的感情。但在最后时刻的这种反缩，不由得使人联想到老天爷，或理想化的正义的道德体系对他发出的凶兆。亨查德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事物的，他怀疑有“一个邪恶的智者”通过苏珊的信揭露伊丽莎白—珍妮的出身，以此来“惩罚他”。作者拒绝了这种解释，并进一步阐明，这一教训破坏了亨查德的自我价值的意识，即使在他能够改变局面的时候，他也放弃了这样的机会，而是日益加深自己独处和孤独的意识。

似乎是为了反驳亨查德的败落是一种偶然的意外，他所活动的那个环境，使人想到是与他的行为相适应的。在这部小说中，“地方”几乎不是哈代创造的——埃格顿荒地和威瑟伯里的农庄显然是早就为《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人物预备好的场地和环境。也许《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决定在多塞特郡附近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家以后写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一开始，就与真正的多塞特郡、它附近的田野和河流就有着深深的联系，涉及到了历史遗迹，并有精确的考古描写。在本书中有关埋葬罗马人的描写，和这部小说杀青后不久他写给多塞特郡考古学会的一份报告是如此相似，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对多塞特城里和附近的地方和建筑进行了如此之多的描述，不禁使人有这样的印象：哈代想要把自己的想像力凝固在这个城市，这里离他一八四〇年出生（约相当于《卡斯特桥市长》故事发生的时间）的地方不远。他在那里接受了教育、当学徒

并参加工作,直到一八六二年。这一切对哈代的想像空间中的真实情景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与特罗洛普^①假想的巴塞特郡,或布莱克默^②笔下北德文郡的杜恩乡村不同,与狄更斯笔下的那个假想的、经过拔高的伦敦也不一样,他的观察细密、切近,因而很准确(小小的差异是允许的,例如,为了使景物更有启发性、更集中,便把科里顿大屋及其带假面雕刻的石拱门,搬到了市场旁,并更名为高地大宅)。哈代需要或渴望在贴近真实的场景上下功夫,其结果就是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最佳的场景效果,使读者感到很自然,很轻松。

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作者的创作靠的是在设置场景以前,先确立一个具有人类学特色的地点,这样,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和无数的前辈相联系的,与此同时,含蓄地表明(是通过行为的中断,对一个地方先前的、有关联的东西加以阐释),戏剧中的人物不仅不是特殊的人,而且还是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反行为的代表。

自然环境使小说的场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在第十一章中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对圆形竞技场(即茅伯利竞技场)进行了充分的描写,给亨查德和刚刚到达的苏珊之间的会面提供了广阔的场景。一看到圆形竞技场的场景,就无需对亨查德和苏珊进行什么描写了,然而,这种描写本身只能使人更加强烈地感到,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至少是部分人物,除了自己个人的生活场景外,尚别有洞天。倘若说这座圆形竞技场曾经是处决过一个毒死了自己配偶的女人的场所的话,那么,它现在是一个男人重续婚约的场所。这个男人曾甩掉了他的配偶——没有使用暴力,但他的那种自私却和那女人的自私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她的丈夫容忍

^① Anthony Trollope(一八一五—一八八二),英国著名小说家,曾写过六部一组的“巴塞特郡小说”。——译注

^② Richard Doddridge Blackmore(一八二五—一九〇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译注

了她的情人 ,但她还是害死了他。此外 ,苏珊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是她带来了纽森的“死讯” ,而她最终以市长夫人的身份体面地告别了这个人世 ,而没有受到公众的谴责——当然 ,我们是事后再来审视这件事的时候 ,才认识到这一点的。尽管这部小说始终是反对将过去和现在分离开的 ,但作者却冷静地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

想像力丰富的当地居民要是在自家的花园里发现一具相对现代的骨架 ,会感到不痛快 ,但他们对这些远古的人形却无动于衷。他们生活的年代是那么久远 ,他们的时代与现在是那么不同 ,他们的希望和旨趣和自己差得那么远 ,好像在他们和活着的人之间有一条连灵魂都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本书中 ,一段类似的上下文中 ,会出现几个场景——尤其是在涉及到同一事物时。比如 ,第三十二章的开头部分和第六章几乎完全一样 :这里写到了多彻斯特和卡斯特桥之间有两座桥 ,它们被描写成失意者不同心理反映的代表 ,随后就是小说中两位最接近成功和失败这两个概念的人之间的相互易位 :亨查德靠在远处的桥上 ,而伐弗雷走来向亨查德提议 ,在自己的房子里为他提供一个栖身之处(以前这座房子是亨查德的)。相似的是 ,在接下来的一章 ,开宗明义就写到了卡斯特桥有一个“参加欢宴的习惯”——常去教堂的人和唱诗班的人在“三水手旅店” ,饮半品脱酒。这是一件“在这个日子里”该做的事。恪守传统的人们饮酒的众生相 ,和接下来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亨查德醉醺醺地庆祝自己二十一年戒酒誓言的结束。

于是 ,在本书对过去习惯或现实生活准则的描写中 ,在这个地点上演了一幕接一幕的场景。尽管在这一描写中 ,主要角色并没有参与进去(伐弗雷无关痛痒地说了一声 :“世界就是这样的。”亨

查德麻木不仁地说：“风水轮流转啊，不是吗？”他们以此来承认人生的沉浮，这就是他们离这些桥最近的时候了）。本书的描写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一般和特例之间穿梭进行。因此，在上下文和章节之间，事件和“意义”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例如，人们对那两座桥的看法，使这两座建筑获得了自身的价值，部分原因恰好是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与城市的关系，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和较远的乡村的关系所造成的。“亲近”是关键问题，亨查德对周围人的亲近影响着自己对他们的感情。米克森胡同里所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行为，使它成为具有道德意义的场所。它是这个城市的一块脓疮。事实表明，它和这个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那些独立于这个卑微至极的社会阶层的其他成员极尽破坏之能事。这地方的现状激发了哈代去阐释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拱顶石上的人面浮雕也许只是个不起眼的标志物，但在米克森胡同，通过与人类活动的联系，便获得了自身的含义（即意味着“阴谋”）。它横跨在通往高地大宅的后门上——这是露茜塔在卡斯特桥选择的居所，她租下这里是为了实施她的计划的一部分：让亨查德娶她。但在这座房子里，她却想方设法诱使伐弗雷将感情从伊丽莎白——珍妮的身上转移了。

哈代从环境中所生发的联想中，有两点是最重要的，即来自于罗马时代的遗迹，和城乡间极为密切的联系。正如上边的引文所暗示的那样，罗马人的持续存在提供了一个永恒的尺度，一个对我们狂热的生活（它也会成为过去，静止地保存下去）的慰藉。对与城镇紧密相连的乡村生活的描写，构成了一幅有机的整体社会的完美画面：

上面已经略略提到过，卡斯特桥是个被庄稼地包围的地方。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郊区，也没有城乡结合区。它干脆脆、界限分明地毗邻着广袤的沃野，就像绿色的台布上摆着的

一个棋盘。农民的孩子能坐在大麦草垛下把石子扔进政府职员
的窗子里,收庄稼的人能站在麦捆中向站在人行道拐角处的
熟人点头打招呼。穿着红袍的法官在审理偷羊贼时,会在
咩咩的羊叫声中进行宣判,偷剩下的羊在附近吃草,那羊叫声
就是从那里飘进窗口的。要是执行死刑,等待的人群就站在
紧挨在法场前的一片草地上,暂时把牛赶走,给观刑的人腾出
地方来。

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的这一田园诗般的景象,随后便被米克
森胡同大大地破坏了,然而它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
然,了解这世界的阴暗面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们自然要认识到
的。

当哈代对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抱负重新加以考虑时,我有两点
看法,对作者在地点上的选择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两点看
法将阐明他笔下悲剧的类型。第一,我所提到过的或引述过的那
些对地点的描写,表明作者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性
格与主要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事先知晓的。这种预先的知晓
表明,作者和希腊悲剧的合唱队之间有着相似性,为普遍的标准提
供了一个智慧的基础。当然,《卡斯特桥市长》的作者像希腊悲剧
的合唱队一样,妨碍了人们对确切底细的了解,这也是不争的事
实。也就是说,作者的参与具有戏剧的性质,具有环境压力的性
质。正像希腊合唱队总是重复主角刚刚表达过的感情,仿佛是为
了加强悲剧中对立力量的意识。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中也是
这样做的。在事情无法解决的时刻,作者便参与了进去,使短暂的戏
剧得以延续。预先的知晓和矛盾的无法解决,显然决定了作者在
《卡斯特桥市长》中的角色。像《德伯家的苔丝》那样,本书的作者
没有明显的主观性。或者说,像《无名的裘德》那样,对控制和分离
没有采取自我放弃的态度。第二,本书对地点的强调,不可避免地